

中国蒙元史

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



主编 方铁 邹建达



民族出版社

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 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

方 铁 邹建达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
会文集/方铁、邹建达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105-10587-8

I. 中… II. ①方…②邹… III. 少数民族—民族历史—
中国—元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R280.0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9053号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王沙峰

封面设计: 邓树雄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25千字

印 张: 25.5

定 价: 50.00元

ISBN 978-7-105-10587-8/K · 1895 (汉1030)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关于《元朝秘史》书名问题之再探讨·····	方龄贵 (1)
长安竹林寺碑译释·····	蔡美彪 (15)
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	陈高华 (25)
元代多元文化社会的言语文字二题·····	陈得芝 (50)
金和南宋初有关蒙古史料之考证·····	周良霄 (59)
元代云南的佛教和民族交流·····	周清澍 (65)
试论忽必烈成功地实现了元朝的大统一·····	蔡志纯 (76)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刘迎胜 (96)
乱世争雄：明玉珍和他的时代·····	陈世松 (107)
内丘扁鹊庙的元代碑刻·····	孟繁清 (120)
元人眼中的文天祥·····	韩志远 (138)
——兼谈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中国少数民族佛教典籍概况·····	金 峰 (149)
——蒙古文《大藏经》影印对勘本绪论	
回鹘式蒙文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徐文堪 (166)
——特木尔陶高教授近著读后	
《西安清真寺洪武25年圣旨碑》所见元明时期穆斯林的变迁·····	船田善之 (172)
宋元时期科举中的高丽进士·····	裴淑姬 (184)
忽思慧《饮膳正要》“鱼品”和“果品”部分条目校释·····	尚衍斌 (199)
清朝入关前对蒙古立法初探·····	达力扎布 (221)
虞赵居监·····	王 颀 (247)
——元《大一统志》修纂人员探索	
《元典章·新集》一条文书看元朝中后期的御前奏闻决策机制·····	张 帆 (262)
——兼析《新元史》等书的相关谬误	

元代公文起首语初探·····	刘 晓 (274)
——兼论《全元文》所收顺帝诏书等相关问题	
合撒儿后王领地及其拓展·····	胡日查 (287)
天历兵变中的大理总管段氏·····	方 慧 (290)
论元朝的土官制度·····	方 铁 (298)
忽必烈征大理路线考·····	石坚军 (310)
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述评·····	刘迎胜 (352)
六十年治学的足迹·····	刘迎胜 (355)
——敬贺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	
方龄贵先生治学经验的启示·····	朱惠荣 (360)
杨剑利：蒙古族入滇与方氏家风·····	杨剑利 (362)
会议组织工作简况·····	(366)
会议代表名录·····	(367)
会议论文及论文提要目录·····	(370)
我和蒙元史研究·····	方龄贵 (372)
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专业工具书·····	姚景安 (385)
——《元朝秘史通检》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吴晓铃 (389)
元史学和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新收获·····	徐文堪 (391)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编后	
友人来信及评价摘录·····	(393)
方龄贵教授主要论著目录·····	(396)
后记·····	(401)

关于《元朝秘史》书名问题之再探讨

方龄贵

《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是十三世纪用蒙古文写成的一部重要典籍,明初译为汉文,标名《元朝秘史》,并在卷首分两行著录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格式如下:

忙豁仑纽察

元朝秘史卷一

脱(卜)察安

按“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语犹言“蒙古的秘密的历史”或《蒙古秘史》,乃研究蒙古早期历史、文学、语言、社会制度等方面无可取代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夙为治蒙古学特别是蒙古史者必治之书,海内外学者致力所在。“秘史学”已成为当今学术界一种“显学”。惟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对有关此书的一些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尚待解决的不同看法,例如关于《元朝秘史》的书名问题。挽近前苏联蒙古史专家潘克福(Б. И. Панкратов)教授在他为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即《永乐大典》本,旧称俄本)影印本所写的前言中,就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所说有一定代表性。为了解个中原委,便于探考,特不避繁冗,转录其有关文字如下:

我们能否确认《忙豁仑纽察脱察安》即为此书原有之蒙文提名呢?如果在畏兀儿文本,亦即汉文移录所据之原本中就曾写有这些字的话,那么在汉字注音本中作为原有题名,这些字必然要写在第一页第一行之首。但事实是,所有钞本第一页第一行开首均书汉文题名《元朝秘史》(可以设想,最初当是《元朝秘史》),而蒙文题名却书于汉文题名之下,以小字写,分两行——如通常注释的写法。然而汉人以汉字音注此典籍时,始终不变地遵循着一个原则——先以大字书注音蒙文,复于右侧以小字逐词译之。而题名的写法却不符合这一严格不变的原

则。这便产生一个疑问：在畏兀儿文的原稿本中是否有标题呢？如果没有，那么这部书又何以称之呢？《元朝秘史》以及《忙豁仑纽察脱察安》的题名又是何自而来呢？我们看见，紧接《元朝秘史》题名之后，第一段蒙文这样写道：

“成吉思合罕讷 忽札兀儿

迭额列 腾格理额扯 札牙阿秃 脱列克先 孛儿帖赤那 阿主兀 格儿该亦讷 豁埃马阑勒 阿只埃 腾汲思 客秃勒周 亦列罢……”

大多数蒙古学家翻译这一段时，理解为：“成吉思汗的祖先乃是孛儿帖赤那奉上天之命而生，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是渡过腾汲思而来到的……”

（柯津〔С·А·Козин〕译，其他译本与此均无原则出入）。然而首先应注意到，“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诸字在所有的钞本中俱专写一行，这些字下面到此行之末均为空白，这里尽可容下10——12个汉字，而将下一行之首“迭额列腾格理额扯札牙阿秃……”等字写进来。这样分行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断定，自“成吉思”始至下一行末的“阿主兀”止是一个句子，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句子拆开，把一部分写在一行里，把另一部分写在另一行里，而在第一行留下一段完全不必要的空白呢？我们觉得，为蒙文作汉字注音的人，将上述词句专写一行是严格遵照了畏兀儿原本的分行原则，在原本中写于下一行之前的“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诸字当是题名。再者，“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与下一行字在语法上没有任何联系，实为一完全独立的句子。故而我们将上面所引过的一段作如下译法：“成吉思的家世（或译出身、身世、根源）。有一孛儿帖赤那奉上天之命而生。他的妻子是豁埃马阑勒。他们是渡过腾汲思水而来到的。”我们觉得非常可能“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是畏兀儿文原稿的题目，而这一部分，竟占了该籍全文的十分之九。^①

其实早在1907年（清光绪33年），日本蒙古学界最为前辈的那珂通世博士所译注的《元朝秘史》就取名为《成吉思汗实录》，并将原书卷一首行“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转译为“成吉思合罕之根源”，用句号标点断句，具见此意。迨至1940年，石滨纯太郎教授撰为《元朝秘史考》更明白提出：今本《元朝秘史》正集本称《成吉思源流》后附加续集，乃至元修史之际，题为《蒙古秘史》云云。^②但这个说法受到洪煊莲（William Hung）教授的反驳，见所撰《元朝秘史源流考》。^③今按以

① 见《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3辑所收刘魁立译文。

② 参见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1954年日本学术振兴会刊本第155页。

③ 原载HJAS 1951 vol.14，黄时鉴先生有译文，见元史研究会编《中国元史研究通讯》1982年（2）。

“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为《秘史》的题名,有两点无法解释,这牵涉到《秘史》分为正集、续集问题。倘说全书题名为“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何以续集中包括斡阔台在位时的记事?又假定“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叙事至正集卷十而止,何以在十卷结尾却无一字跋文,如续集结尾之所见?凡此都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看来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还有待进一步作深入探讨。

这可以从几方面来考察。

一、关于《元朝秘史》和《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关系的问题

应当指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双行小字,惟见之于《四部丛刊》三编(顾校配补本)《秘史》及由叶德辉观古堂据文廷式自顾校传钞之《秘史》刊本,而《大典》本原无,据顾广圻《秘史》跋:“去年授徒庐州府晋江张太守许,见所收影元槧(《秘史》)旧钞本,通体完善,今年至扬州,遂丛愚古余先生借来,覆影此部,仍见命校勘,乃知异于钱少詹本者,不特分《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一事也。即如卷首标题下分注二行,左“忙豁仑纽察”五字,右“脱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书人名衔,而少詹本无之,当依此补正。”这里把“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说成“撰书人名衔”自然是错的,顾氏不谙蒙语,不足论,今《大典》本《秘史》已增写此八字(有误字),当系鲍廷博依顾跋补正。从前伯希和(P. Pelliot)教授曾检出;《秘史》总译殆成书于汉字音译之先,王国维在《蒙文元朝秘史跋》中也认为:“考宋濂《銓坡集》四有《吕氏采史目录序》云: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元史。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至于宁宗,总一百五十九卷。顺帝三十六年之事,旧乏实录,阙略不备,于是奏遣使者十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章贡吕仲善时司膳成均,乃被是选。是月癸卯即乘驿北上,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诏令奏疏拜罢奏请布在方册者,悉辑为一。有涉于番文,则令译而成文,至冬十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计者八十,昇至行中书省,借官印识之,进于南京,濂于是有所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七月(洪武三年)复诣阙上进云云。是洪武二年采史之役,实兼译事。此《元朝秘史》亦即所译番文之一。”^①今按王氏所论甚精,采史之役,虽以顺帝三十六年史事为主,但对前此有关文献,谅亦当在相机搜检之例。王氏所引宋濂《吕氏采史目录

^①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6。

序》关于吕复(仲善)采辑所得,还有“所拓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①很难设想这五百通碑文悉数有关顺帝一朝之事,然则对番文移译成书,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据查吕复在北平汇编采史之所得,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丁丑(十五日,以阴历计,下同)开局于国子监,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十一月初一)^②始完,历时两个半月,凡七十五天。查《秘史》总译之文约四万字,以为时七十五天来核算,每日大致译成550字,设如参加译事者为两个人,则工作量并不甚重,时间上当可从容足成之。

可注意的是,伯希和主张《秘史》总译与音译(蒙语汉字标音及旁译)并非同时成书,总译在前,音译在后。^③知者总译在供修史之用,音译为编类《华夷译语》取备参考,两者作用不同,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伯氏所说,可为不刊之论。至于伯氏认为《秘史》总译与音译所据为两种不同的版本,其理由是今本汉字标音蒙文《秘史》第47节有如下一段文字:

察剌孩领忽因 可温 想昆必勒格

名 的 子 名

俺巴孩 坛 泰亦赤兀惕 斡字黑坛 字鲁罢

名 每 一种 姓每 做了

转写其对音为:

Čaraqai—lingqu —yin kō'un Senggūm—bilge Ambaqai tan Tayiči'ud
oboč—tan boluba

而汉语总译则作:

察剌孩领忽生子名想昆必勒格,想昆必勒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姓氏。

与音译显然不同。伯氏因据柯立夫(F. W. Cleaves)教授编印哈佛燕京学社版行的乌兰巴托本罗布藏丹津(bLo—bzam—bsTan • ' jin)所著《黄金史》(Altan Tobci)与此相关文字:

Čirqai—Lingqu—yin kūbā' ūn , Šinggūm—Bālgā nārātú būlū'
ā, Šinnngūm Bālgā—yin Kōbā' ūn Isalai—qa' an Tāri' ūtān Tayiji'

①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7。

② 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第158页。

③ 参见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第212页。

ut omoqtan bolba.^①

而补正为:

Čaraqai—Lingqu—yin kö' ün Sänggüm—Bigä (būlä' ä; Sänggüm—
Bilgä—yin kö' ün) Ambaqai (—qahan töri' ütän) Tayiči'ut oboqtan
būlä' ä.^②

伯氏所见极是。但谓《秘史》总译与音译出于两种不同版本,疑尚可议。我倒是倾向于我国台湾学者札奇斯钦教授所著《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第52节注(2)的看法,说是:“想昆·必勒格与俺巴孩的关系,本节明确的指为父子;而四十七节似作兄弟,按蒙古语原文推究,本节记载是详明无疑的;而四十七节的记事则为‘察儿孩领忽——因可温 想昆·必勒格 俺巴孩坛’,似有文字脱落之嫌。按《秘史》的笔法(尤其是本节),凡‘儿子’的复数。都是可兀惕kö' üd,其旁译是‘子每’。独在此处于作‘可温’,旁译作‘子’。可见四十七节的记载应是‘察儿孩·领忽的儿子想昆·必勒格……(和他的儿子)……俺巴孩等’,才对。同时按本节的记载来推查,见知第四十七节似有文字脱落,而造成两人关系的混淆不清。”

札奇斯钦所说,宜若可信。我并且疑心《秘史》音译所用之本当即总译所用之本,大概蒙文原本是跟总译一道由北平送到南京的。总译意在供续修元史之所需,事在1369年,音译乃为编类《华夷译语》取备参考之用。查《华夷译语》的编纂,奉诏始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迄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刘三吾为之作序,前后历时七至八年,《秘史》音译(附旁译)约略同时。说音译所据为随同总译并即进呈南京之蒙文原稿,可作如下解释:一则此书既名为《秘史》,事关禁秘,在元代,人间未必另有复本;再则元史的纂修,十三朝实录乃主要史料,宋濂《元史目录后记》云:“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书,悉入于秘府”。今按所谓“金匱之书,悉入于秘府”,夷考其实,恐未必尽然。《元史·后妃表》小序:“累朝尝诏有司修后妃传,而未见成书,内廷事秘,今莫之考。”又《宗室世系表》小序:“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是其例。倘吕复采史之前,南京已有《秘史》蒙文写本,初修元史时何不译出备用,而必劳吕复北上采史乃总译而出,为不可解。因推定音译蒙文《秘史》原稿连同总译一并运送南京。

① 伯氏所引见Altan Tobči 原书上卷第19页左起2—4行。

② 参见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55—56页,又70页注(3)。

至于《秘史》音译(附旁译)与总译综合成书,仍用《元朝秘史》旧译为书名,而以双行小字附注《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亦自有故。按总译书名《元朝秘史》,当为世俗所习用,洪武下诏编类《华夷译语》时且有“取《元朝秘史》参考”之语,则《元朝秘史》书名已成定谳。^①《元朝秘史》乃《元朝秘史》之省词,可通用,并无歧义。从而上行下效,以《元朝秘史》名全书,并追本朔源,将本书汉译蒙文原稿《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书名(即《蒙古秘史》),以双行小字附注于《元朝秘史》卷一之下。是总译《元朝秘史》与音译《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书名,此出于彼,一为汉译,一为转写蒙文原稿汉字标音,并无二致。

至若有人怀疑,倘或《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为本书原名,不应置于《元朝秘史》卷一之下,依译例,当置于《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之上或之前,而旁译为《达达的历史》云云。今按这恐怕是泥于《秘史》音译(附旁译)与总译同时成书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如果认定《秘史》总译在前而音译(附旁译)在后,及书名《元朝秘史》的来龙去脉,那么对《秘史》音译与总译综合成书之际,用《元朝秘史》为名,而考其源流,以双行小字附注《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的蒙文原稿书名)于《元朝秘史》卷一之后,也就豁然了。

二、关于“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是否原书题名的问题

这方面,最可注意的是上引潘克福教授在《元朝秘史》(十五卷本)前言中提出来的看法。他认为:《秘史》中“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是畏兀儿文原稿的题目。根据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在各本《秘史》中都是专写一行,而此行之末为空白,留下可容10至12个汉字的余地,却没有把下文“迭额列腾格理”等字写下来。因宣称“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与下一行字在语法上没有任何联系,实为一完全独立的句子。因而将“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译为“成吉思汗的家世(或译出身、身世、根源)”当作原书题名。

这里把“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跟下文抬头提行的“迭额列腾格理”截然分开,认为两者在语法上没有任何联系。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①《明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朝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不是的。按汉字标音蒙语“迭额列腾格理”旁译“上天”，原文“迭额列腾格理额扯札牙阿秃”旁译“上天处命有的”通译“上天眷命”。须知蒙古人最重视天，备见著录。彭大雅《黑鞑事略》：“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谓天识者。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又“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赵珙《蒙鞑备录》祭祀条：“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查涵芬楼本《华夷译语》天文门：雷作“腾吉里董豁敦”，同上天作“腾吉里”，又据《秘史》第246节：董豁敦旁译“怪责了”，是训雷的“腾吉里董豁敦”此言“天怪责了”，与《蒙鞑备录》以雷声为“天叫”为义隐合，可为蒙古人重天之证。

兹请就在元代碑刻及典籍中凡遇关乎“上天”、“长生天”、“天地”等字样必抬头提行，以《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①《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②《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③，《云南王藏经碑》^④收录的元碑并元刊《元典章》之文为例以论证之。

查《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所收《一三一四年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其汉字第一行“长生天气力里”，第十三行及第十五行两见“(告)天祝寿者”均提行，八思巴字同。《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图版四《龙门神禹庙圣旨碑》首行“长生天气力里”提行，八思巴字同。图版五《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数见“长生天气力里”均提行，又两见“(敬)天崇道”，一见“(口意告)天”，均亦提行，八思巴字同。余碑累见“上天眷命”全提行，八思巴字同。《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二金石考所收《大理崇圣寺圣旨碑》，据拓片第一行“长生天气力里”，第十一行、第十三行两见“(告)天祝寿”均抬头提行；同上卷九十三金石考所收《昆明筇竹寺圣旨碑》，据拓片第一行“长生天气力里”，第十二行、十四行两见“(告)天祝寿”，均亦抬头提行。又《云南王藏经碑》凡遇“天的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札牙笃皇帝(引者按：即文宗图帖睦尔，此其蒙古语谥号)福荫里”、“皇帝的福荫”、“(为)皇帝祈福”，莫不抬头提行。

返观元刊《元典章》对关乎“天”字等词的处理采取两种方式：

①(美)鲍培(N. Poppe)原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

②罗常培、蔡美彪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二、九十三金石考。

④《云南王藏经碑》后至元六年(1340年)刻于《昆明筇竹寺圣旨碑》阴，原为畏兀儿文，经道布先生转

一、通用之“天”字如“天下”、“应天”、“天人”、“天罚”、“天裁”等用词，文中连书不提行。

二、凡“上天眷命”、“长生天气力里”、“天地”与所谓“天子”等关乎“天”字之词，概行抬头提行。条举过于烦琐，分别表列如下：

- 1、长生天气力里 二见
- 2、上天眷命 十七见
- 3、上天之命 一见
- 4、(荷)天护助 一见
- 5、天地之德 一见
- 6、天地之昇 一见
- 7、天地祖宗 一见
- 8、(受)天明命 一见
- 9、(惟)天惟祖 一见
- 10、(惟)天惟祖宗 一见
- 11、统天继圣 一见
- 12、上天之鸿禧 一见
- 13、(荷)天鸿禧 一见
- 14、(荷)天地之鸿禧 一见
- 15、天子 一见
- 16、天子拱祠 二见(“拱”一作“供”)
- 17、(告)天 一见
- 18、(拜)天 一见
- 19、(拜)天节 一见
- 20、天寿 一见
- 21、(告)天祝寿 五见
- 22、(告)天祝延圣寿 一见
- 23、天寿圣节 三见
- 24、天寿节 二见

然则《秘史》卷一第1节将“迭额列腾格理”(旁译“上天”)视同此例，斯未

写译注为《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刊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4)。本文所引此碑汉译及拉丁字转写对音并行文款式，均依道布先生原作。

可执为与上文“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无干。

这里有一个问题。《秘史》卷一第1节将“迭额列腾格理”(上天)抬头提行,是符合元代行文体例的,其余各节与“腾格理”(“天”)、“腾吉理”(“天”)有关文字又如何呢?今按《秘史》与“腾格理”、“腾吉理”有关之词凡四十九见(属于巫名“帖卜腾格理”者未计入),分别作“腾格理”(“天”),“腾吉理”(“天”),“腾格理迭”(“天行”),“腾吉理因”(“天的”),“腾吉理额扯(彻)”(“天处”、“天行”),“腾吉理合札儿”(“天地”),“腾吉理合札刺”(“天地行”),“蒙客腾格理”(“长生天”)如此等等。其中除卷一第1节“迭额列(上)腾格理(天)额扯(处)札牙阿秃(命有的)抬头提行外,余均未见抬头提行。特别引人注目的如“蒙客腾格理”(“长生天”)二见,“蒙客腾格理因”(“长生天的”)三见,皆未提行。按“蒙客腾格理”即“长生天”乃元代圣旨碑开首及《元典章》累见之词。又“迭额列腾格理”即“上天”二见,一为《秘史》卷一第1节初见抬头提行之词,而另一见《秘史》卷六第177节却并未提行,此必有说。据上引元代碑铭及元刊《元典章》之文看来,在元代,凡行文遇关乎“天”(“腾格理”、“腾吉理”),尤其“长生天”(“蒙客腾格理”)、“上天”(“迭额列腾格理”)、“天地”(“腾吉理合札儿”)等词语乃必抬头提行,系一代定制。“迭额列腾格理”在《秘史》卷一第1节抬头提行,乃照录原稿,足为范例。下文遇“长生天”、“上天”等词不复提行,谅因时过境迁,译人移译前朝文典,没有按蒙文之原稿悉数严格遵守元代行文体例,此亦理中或有之事。倘说蒙文原稿就未抬头提行,那是有悖于常理的。

这仍可用《元典章》作例。据查通行的清末沈家本刻的《元典章》,举凡上引元刊《元典章》所收“上天”、“长生天”、“天地”及关乎“天”的若干抬头提行语词,沈刻本概未抬头提行。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卷一第十《抬头遗迹改革未尽例》早已检出:“元刻《元典章》抬头极多,有平抬、单抬、双抬,沈刻悉为连缀。”又说“然亦偶有遗留,且因此而致误者。”举例主要为“国家”、“圣旨”、“上位”、“太皇太后”、“诏书”等条,而未涉及“上天”、“长生天”、“天地”及关乎“天子”等语词,凡此可为后世对元朝文典未遵旧制之证。至于沈刻《元典章》是否依所据之本而如此作,那倒是无关紧要的了。由此可见今本《秘史》于此等语词并未抬头提行,也就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以上所说,意在考订《秘史》卷一第1节“迭额列腾格理”(“上天”)之文所以抬头提行,乃与元代行文体例有关,实与上文“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连续

为句；不容因有空格而割裂，从而把“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当作书的题名。

三、说“人祖”

《秘史》卷一第1节总译见有“当初元朝的人祖”一语，从来各家似多未留意，惟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改为“当初元朝人的祖”，并加按语说：“张本（张穆《连筠簪丛书》本）作‘元朝的人祖’。”李文田大概觉得“元朝的人祖”其“人祖”二字不成词，故而乙改为“元朝人的祖”。可是李改全凭臆测，并无根据，这一改，与本文的原意就离谱了。其实原文“人祖”二字是大可玩味而深长思之的。按此语乃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的汉文译字，直译当作“成吉思汗的根源”，这里把“成吉思合罕”译作“元朝”，皆因总译原备续修元史之用，故在此用“元朝”字样，与将蒙文《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译为《元朝秘史》同例。而把本训“根源”的“忽札兀儿”译为“人祖”，尤具深意，这跟下文“是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共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联系起来，就更醒目了。上文说“元朝的人祖”，这里又说“产了一个人”。据文义，显然把苍狼、白鹿当作两个实物，所以特别强调“产了一个人”。这个“人”字与上文元朝的“人祖”的“人”字无疑是互相照应的。据查汉字标音蒙文，此处原作：

成吉思（名）合罕讷（皇帝的）忽札兀儿（根源）

迭额列（上）腾格理（天）额扯（处）札牙阿秃（命有的）脱列克先（生了的）孛儿帖（苍色）赤那（狼）阿主兀（有）格儿该（妻）亦讷（他的）豁埃（惨白色）马阑勒（鹿）阿只埃（有来）腾汲思（水名）客秃勒周（渡着）亦列罢（来了）斡难（河名）沐涟讷（河的）帖里兀捏（源行）不而罕合勒敦纳（山名行）嫩秃黑刺周（营盘做着）脱列克先（生了的）巴塔赤罕（人名）阿术兀（有来）

按蒙语“脱列克先”通《秘史》凡十九见，旁译分别作“生了”、“生了的”。是《秘史》“脱列克先巴塔赤罕阿主兀”直译当作“生了巴塔赤罕”，总译“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其“产了一个人”云云，明系承上文“元朝的人祖”之“人祖”二字而来，是上下文原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或把“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书的题名，那“人祖”和“产了一个人”这两个“人”字就互相脱节，衔接不上了。当然，苍狼、白鹿都是人名而非实物，《黄金史》里是记载得明

明白白的。^①这说明总译者纵然对狼、鹿生人之说在理解上可能不够准确，但在语法上把上下文连成一体，却是无可非议的。

应当指出，狼鹿生人之说，在明代似乎广为流传，不惟见之于《万姓统谱》、《三才图会》等明人著作直引“秘史”狼、鹿生人之说，^②且见之于文学作品。朱有燉（1379~1439年）撰写的《桃源景》剧演述李钊与其妻桃源景所开酒店，有两个蒙古牧马人来饮酒，双方因调侃发生纠葛，店家对牧马人以狼鹿生人反唇相讥，略举有关文字如下：

[旦唱][滚绣球]他道是卯兀客勒莎可只，[一净云]得娄吉邻母刺失骨。
[旦唱]他又骂得得娄吉邻母刺失，怎听他唆唆老恁般声气，看了他恰似个木胎儿画上个人皮。[净做趋抢躯老科][旦唱]耸着肩似野狸，睁着眼似饿鬼，正是那惨白鹿青狼苗裔，恼的我一会家似醉如痴。^③

此“正是那惨白鹿青狼苗裔”之句，也不能排除源于《秘史》“当初元朝的人祖，是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云云，也可反证“人祖”两字自有其特定含义，为下文‘产了一个人’伏笔，是随意改动不得的。

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把“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儿”独立断句，以当全书题名，无论如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四、关于《秘史》正集与续集的区别问题

说一说《秘史》正集与续集的区别问题，这跟《秘史》题名没有直接关联，却有间接的关系。《文渊阁书目》字字号第六厨书目收录“《元朝秘史》一部五册”，又“《元朝秘史》续集一部一册。”按据文义当系《秘史》二卷订为一册。检传世的《元朝秘史》四部丛刊三编本及由此书顾校原本传钞而出叶德辉观古堂翻刻之本，均载《秘史》十卷，续集二卷，是为十二卷本，与《文渊阁书目》的著录是相符的。从前石滨纯太郎教授认为《秘史》正集原称《成吉思汗源流》，成书于1240年前，续集二卷乃写于1240年。云云。但似未举证具体史料根据，洪煊莲教授对此早已提出质疑。查《秘史》汉字标音蒙语及旁译，乃奉诏为编类《华夷译语》取备参考，与总译之供续修元史所需不同。故此设想，进一步探索《华夷

① C. Bawden, 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či p. 113,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55.

② 柯立夫(F. W. Cleaves)教授《秘史》英文校注本前言已检出。

③ 参朱有燉《诚斋乐府》，奢摩他室曲丛所收涵芬楼印本。

译语》的编纂与《秘史》音译用字之间的关系,或可从中取证《秘史》音译(附旁译)在时间上是否一次完成,或分两次译出。如属两次译出,又给人以何等启示,说明什么问题。

涵芬楼影印明经厂本《华夷译语》分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皿、衣服、饮食、珍宝、人物、人事、声色、数目、身体、方隅、通用等十七门,共844款,其中第770款“是”包括“拙卜”、“门”两个词,第843款“不拣甚么”包括“阿里别”、“黠巴尔伯”两个词,合计词汇实为846条。因区分为a.《秘史》正集所见语词等同或基本等同于《华夷译语》者;b.《华夷译语》用字独见于《秘史》续集(不见于正集)者;c.《华夷译语》用字不见于《秘史》正、续集而当别有所本者。核对下来的结果:

a.《秘史》正集所见语词等同或基本等同于《华夷译语》者399条。其中所谓等同于《华夷译语》,指的是《秘史》正集所见语词用字与《华夷译语》完全相同,计有285条;其余基本等同于《华夷译语》的语词,《秘史》正集所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用字音同(而字不同),如“石”之于“失”,“讷”之于“奴”,“哥”之于“格”;二是语尾有无-n收声之差异,如“速”之于“孙”,“颠”之于“迭”;三是《华夷译语》用字有时以小写“丁”注于字之上角,以表明《华夷译语凡例》所谓之“顶舌音”,《秘史》多用小写“勒”字旁跨,如《华夷译语》小注“丁”之“温”字《秘史》作“兀勒”,《华夷译语》小注“丁”之“安”字《秘史》作“阿勒”。如此等等,不备录。

b. 独见于《秘史》续集与《华夷译语》相关之语词凡31条。

c.《华夷译语》有关语词不见于《秘史》正、续集而当别有所本者416条。

据此看来,《华夷译语》所收语词,见于《秘史》正集及不见于《秘史》正、续集而当别有所本者,各占《华夷译语》所见半数而弱;最可骇怪的是《华夷译语》所收独见于《秘史》续集的语词只有31条,可谓微乎其微。而一检这31条大抵为日常用语,其中如米、酒、鞭、骡、弟妇、鼻、西、新等词且已见于《至元译语》(《蒙古译语》),余下的例如兔、寺庙、衣襟、媳妇、马夫、醉、生受、翻、拳、面、脚后跟、汗、西、边、紧、短、平等也并非冷僻之词,想来这对刘三吾所说“朔漠之族生于华夏,本俗之文与肩者罕,志通中国四书,咸明其意,遂命以华文译胡语,三五堆垛而其字始全,该对训释而其义始明。”的翰林侍讲火源洁等人莫非连这些普通蒙古语也不懂,还得求之于《秘史》续集么?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揆以洪武上谕编类《华夷译语》时取《元朝秘史》参考,以“纽切其字,以谐